



柳宗元永州后五年山水作品研究

A Study on Liu Zongyuan's Landscape Work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of
His Exile in Yongzhou

严容玉

NYAM YONG YE

21ALB03844

指导教师：余曆雄师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FEBRUARY 2025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4 Nyam Yong Y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1

摘要..... 2

致谢..... 3

第一章 绪论..... 4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资料评述..... 6

 第二节 研究难题与研究方法..... 9

第二章 柳宗元贬谪后的思想转变与山水作品的主题特征..... 12

 第一节 从仕途理想到山水寄情..... 12

 第二节 永州山水作品的主题特征..... 14

第三章 柳宗元山水作品的文本解读..... 19

 第一节 柳宗元代表性山水作品的文本细读..... 19

 第二节 柳宗元山水作品的文学风格演变..... 23

第四章 柳宗元山水作品的诗文互文性探析..... 26

第五章 结论..... 29

参考书目..... 31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严容玉 NYAM YONG YE

学号：21ALB03844

日期：2025 年 5 月 2 日

摘要

柳宗元是唐代中期重要的文学家，其永州贬谪后五年的山水作品在中国古代山水文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展示了丰富的自然景观描写，也深刻映照了柳宗元仕途失意后的思想转变与情感寄托。本研究聚焦于柳宗元永州后五年的山水作品，旨在探讨其思想变化、文学风格特征及诗文体裁选择与表达策略，揭示柳宗元如何通过山水文本寄托政治理想幻灭后的心境，并重新建构个体精神世界。本文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文体比较与历史背景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钴鉞潭西小丘记》《愚溪诗序》等代表性作品，细致解析其自然描写与情感表达的互动机制，同时比较柳宗元贬谪前后文学风格的转变，并考察诗文体裁之间的互文关系。研究发现，柳宗元后期山水作品在题材取向、审美追求与表达策略上展现出明显变化，由早期直抒胸臆转向内敛沉静，通过山水意象折射自我认知与哲思超越，形成了清冷峻拔、象征隐喻与庄禅融合的独特风格。他在山水散文中大量采用富有诗意的语言，体现出诗文互照、体裁灵活自如的创作倾向。

【关键词】

柳宗元；山水作品；永州后期；文体策略；文本细读；思想转变

致谢

在本论文完成之际，我由衷地感谢所有在这一过程中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人。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余曆雄老师，从确定题目到修改定稿，您都一直细心指导、悉心提点。有时候我自己都写得迷迷糊糊了，是您一语道破重点，帮我理清了写作的方向。每次看到您认真批注的修改意见，我都特别感动，也特别有动力把论文写好。非常幸运能在大学的最后阶段遇到一位温和又严谨的好老师。衷心感谢您的帮助与耐心，让我完成了本论文。

同时，也感谢中文系所有任课老师几年来的教诲与栽培，让我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感谢图书馆和资料室提供的丰富资源，使我在撰写过程中得以查阅大量文献。

此外，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情感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支持。

毕业论文虽已完成，但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学术道路的艰辛与充实。衷心感谢所有在我成长道路上给予关心与帮助的人。

第一章 绪论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出身河东柳氏，幼年聪慧，博览群书，青年时期即步入仕途，并迅速崭露头角。唐顺宗时期，柳宗元积极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试图推动政治改革，然而改革因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扑而失败。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在此期间，他的文学创作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后五年的山水作品，不仅在自然景观的描绘上更加细腻生动，更寄托了深沉的情感与哲思，形成了独特的山水审美风格。

柳宗元山水作品的研究历来受到学界关注，其作品不仅体现了其对自然景物的细腻描绘，更融合了深刻的人生感悟与哲理思考。前人研究多聚焦于柳宗元山水散文的写景艺术、孤寂意象与政治隐喻，如孙昌武《柳宗元评传》、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等均对其创作背景与主题意蕴作了详尽分析。近年来，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柳宗元山水作品中的文体特点与思想转变，为本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然而，对于柳宗元如何在诗文体裁之间灵活切换、如何在山水描绘中完成自我表达策略转变，尚缺乏探讨。

基于此，本文将柳宗元永州贬谪后五年的山水作品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思想变化、主题特征、文本细读与文体策略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本文关注以下问题：柳宗元如何通过山水作品映射仕途失意与人生感悟？其山水诗与散文在表达情感、建构意象上

¹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1。

有何异同？他在体裁选择上是否存在主动策略？其山水作品对后世山水文学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细读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辅以历史背景考证与文体学视角。通过对代表性作品的细致解读，探寻其自然描写与情感意涵之间的互动机制；通过前后期作品的比较，揭示柳宗元思想轨迹与文体运用的变化规律。同时，也将考察柳宗元山水作品中哲理意味的深化过程。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概述研究背景、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第二章探讨柳宗元贬谪后思想转变及山水作品的主题特征；第三章通过文本细读解读代表性山水作品的意象与情感表达；第四章分析柳宗元在山水诗与散文体裁中的互文性表现与文体选择；第五章总结研究成果，归纳柳宗元永州后期山水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思想意义，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资料评述

柳宗元作为唐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其文学成就涵盖散文、诗歌以及思想领域等多个方面。自唐代以降，对柳宗元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近现代学术的系统化与多样化发展，使得有关柳宗元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以下将通过文献梳理，回顾前人研究的主要观点，并指出本论文的研究定位与创新之处。

翟满桂在《柳宗元年谱长编》中通过搜集 20 世纪之前的柳宗元年谱，以长编的方式整理研究，从柳氏家族宗亲世系、柳宗元一生的事迹行状入手，全面梳理其官职、仕历、交游、作品系年及历代评论，并分为时事述要、文坛纪事、子厚踪迹、诗文系年四大类逐年编纂。书中突出中唐时代的盛衰特征，尤其强调柳宗元永州十年是其思想最为活跃、文学创作达到高峰的时期。翟氏通过史料考辨，将柳宗元人生遭际与时代变局相结合，勾勒出不同时期的历史画面，为研究柳宗元文学创作的即时性与历时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罗联添的《柳宗元事迹年暨资料类编》则通过事迹系年、资料类编和附录三部分内容，对柳宗元的生平与文学创作进行了详尽梳理。书中不仅汇集了柳宗元的事迹年表，还收录了丰富的相关资料及补充信息，使读者能够从多角度了解柳宗元的生活环境与文学成就。

同时，孙昌武的《柳宗元评传》是一部全面梳理柳宗元生平及思想文化贡献的重要著作。本书首先分析了柳宗元生活的社会与思想环境，勾勒出其作为思想家展开活动

的背景；随后详细描绘了他的生平事迹，重点阐释其生活轨迹与思想演变的过程，接着用主要篇幅深入探讨柳宗元在哲学、社会、政治、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的思想理论及其独特贡献。本书立足于柳宗元作为思想家的身份，因此内容重心自然而然地聚焦于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其影响力。

本论文所引用的柳宗元相关文本，均出自柳宗元所撰、尹占华与韩文奇校注的《柳宗元集校注》。该书收录了柳宗元现存的全部著作，为本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另参考吴文治等主编的《柳宗元大辞典》，该辞典对柳宗元各类著作的创作时间、背景及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并提供相关文献条目，便于查考与延伸阅读。至于历代学者对柳宗元文章的评注，则主要参照高海夫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柳州文钞》，其中辑录了自宋代以来重要学者对柳宗元作品的注解与评论，这些资料为论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与论述支撑。

本论文的研究动机，源自于本人在余曆雄老师所授《唐宋文选》的课程。课程内容激发了我对文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因而决定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柳宗元，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文学风格与思想意涵。永贞元年，参与永贞革新的柳宗元获罪贬谪永州，开始了困居“南荒”的十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只是朝廷安置贬谪官员的闲职，甚至被规定不能干预政务。²于是，贬谪之后只得穷愁著书成为他埋头创作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南荒之地的幽怨情绪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宣泄，并由此他寻求到一种心灵的慰藉。³

² 柳宗元的职务全称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

³ 龚玉兰，《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页66。

柳宗元在永州贬谪后五年（即元和五年至元和九年，810—814年）是他人生中重要的创作阶段之一。与初到永州时的彷徨与孤独相比，这一时期的柳宗元在思想和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他的创作更加内敛深沉，内容从对政治失意和人生命运的感慨，逐步扩展到对自然、民生和哲学的广泛探讨。研究柳宗元永州后五年的山水作品，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思想轨迹及其文学表达，挖掘这一阶段创作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在永州的后五年，柳宗元的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均表现出显著变化。柳宗元各种诗体都很出色，尤其五古⁴、绝句、五言排律、辞赋等等。现存的柳诗，绝大多数是他贬谪到永州以后的作品，不仅富有地域特色、艰苦而似乎悠闲的生活表现在诗歌中，有一种简淡高逸的感觉，但细细品味，却包含着深沉的哀怨情愫，柳宗元在贬谪地的痛苦、忧郁的感伤情绪十分浓重。⁵此外，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展现了他对永州山水别样的审美理解，在作品中注入了深邃的情感，营造出清幽、旷远而宁静的意境。由于柳宗元性格忧郁，心境悲凉，所以他笔下的景物格外幽静，更加衬托出寂寞之情。⁶这一阶段创作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深入理解柳宗元的个人文学成就，还能够揭示唐代士人在政治挫折后如何通过文化创造寻找精神支点，为文学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⁴ 龚玉兰，《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研究》，页 95。

⁵ 龚玉兰，《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研究》，页 93。

⁶ 龚玉兰，《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研究》，页 95。

第二节 研究难题与研究方法

本论文聚焦于柳宗元在永州后五年的文学创作，旨在探讨这一时期特殊生活背景如何影响其作品的主题与风格。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环境、思想变化与创作历程密切相关。他的诗文在关怀民生、描写山水以及个人反思方面，展现出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强烈的个人情感表达。因此，本文特别关注柳宗元对自然的描写，研究他在山水散文和诗歌中运用自然意象的方式，以及这些意象如何反映他的孤独情感与超脱思想。整体上，论文希望通过细致分析柳宗元在永州后五年的创作特点，揭示这一时期作品的艺术成就与思想价值，同时讨论其对后世文学与思想发展的影响。

为实现上述目标，论文采用历史文献法、文本分析法和对比研究法三种方法。这些方法的选择都是基于研究内容的特性，并且紧密围绕论文的研究目标展开。

历史文献法在本论文中占有重要地位。柳宗元的创作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关系密切，因此，通过历史文献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和时代环境，是理解其作品的重要前提。论文参考了翟满桂在《柳宗元年谱长编》中的研究，该书通过整理二十世纪前的各种年谱资料，以长编的方式系统梳理柳宗元的家族背景、生平事迹、官职履历、交游状况、作品年代和历代评论，并分为时事述要、文坛纪事、子厚踪迹和诗文系年四大部分。这种处理方式为进一步理解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特别是在分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山水散文时，结合永州的自然环境与柳宗元贬谪后的生活经历，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背景与思想意涵。

文本分析法是论文的核心方法，主要用于细读柳宗元的诗文。通过分析语言运用、结构安排和意象建构，深入探讨作品的艺术特色与思想深度。例如，在《永州八记》中，柳宗元以简洁有力的语言，描绘了丰富生动的自然景观，同时融入对孤独与寂寞情感的表达。文本分析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柳宗元如何通过具体的文学技巧，传达其哲学思考与人生体验。此外，柳宗元散文一向以结构严谨、语言精炼著称，运用文本分析法可以进一步揭示这些特点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及其作用。

对比研究法作为辅助方法，用来将柳宗元永州后五年的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作品进行对照，分析其风格与思想的变化。柳宗元的创作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转变，通过对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例如，将他永州早期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与后期的《袁家渴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在自然描写中逐步加入了更多哲理性的思考。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主要遇到的困难是研究过程中一个显著的难点在于柳宗元的永州创作涉及的文献范围较为广泛且内容繁杂。柳宗元在永州后五年的创作涵盖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题材风格多样，包括自然景物、民生疾苦、个人情感以及哲学思考等。此外，还有诸多后世学者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与解读，这些文献不仅数量庞大且观点多样。因此，如何系统梳理和整合这些文献，以避免遗漏关键作品和重要观点，是一个重要挑战。为应对这一问题，论文拟采用文献综述与分类整理的研究策略。首先，全面收集柳宗元在永州后五年创作的散文与诗歌，并按主题、创作时间和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其次，参考权威文献目录，如《柳宗元年谱长篇》、《柳宗事迹年暨资料汇编》等，以确保所选文本具有代表性和完整性。同时，通过借助工具，对文献进行

检索和整理，优化分析效率，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其次，时间限制。由于学士论文的完成期限为一个学期，研究范围不得不有所收缩，主要选择了几篇较为重要的作品作为切入点进行探讨。虽然受限于时间，但在努力下仍完成了部分阶段性的成果。

第二章 柳宗元贬谪后的思想转变与山水作品的主题特征

柳宗元在被贬谪至永州的十年间，其文学创作经历了显著的转变。特别是在贬谪后期的五年中，他的作品在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上均展现出深刻的变化。早年间，柳宗元怀抱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积极投身改革事业，然而仕途的挫败与政治理想的破灭，使他在永州的孤寂岁月中逐渐完成了由积极入世到退隐山水、寄情自然的思想转向。这一心路历程不仅反映在他丰富的山水作品中，也成为理解其晚期文学创作的关键线索。

本文第二章将结合柳宗元的生平经历与贬谪背景，系统梳理他在仕途理想破灭后的心理变化，分析他如何借助山水作品抒发失意情绪、寄托人生感悟。通过细读其永州后五年的代表性山水散文与诗歌，将揭示柳宗元在山水描写中所体现出的复杂情感结构、自然意象的深层寓意，从而为理解柳宗元山水文学的独特价值提供新的视角。

第一节 从仕途理想到山水寄情

柳宗元早年受儒家思想熏陶，主张“经世济民”，希望通过仕途实现政治理想。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积极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试图打破宦官专权、整顿吏治，推动政治改革。然而，这场改革仅持续数月便因保守势力的反扑而失败，王叔文被杀，改革派遭到全面清算。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虽然名义上是地方官员，实则处于政治边缘，仕途几乎断绝。这一政治挫折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促使其思想发

生深刻转变，并最终体现在其后期山水作品之中。

贬谪之初，柳宗元仍心怀不甘，早期作品中充满了愤懑不平之情，如《寄许京兆孟容书》，亦如文后所说“书辞繁委”⁷。柳宗元在文中援引直不疑等十七个历史实例，批评当时政局中谗言横行、是非颠倒的现象，感慨“已无古人之实，而有其诟，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⁸的处境，流露出对朝廷的失望与痛苦。由于反复上疏无果、生活环境艰苦，柳宗元逐渐意识到仕途已不可为，遂在山水之中寄托情感，心境也逐渐趋于平和，愤世嫉俗的情绪也逐步转化为对山水的寄托。此时，山水不仅成为其情感宣泄的媒介，更成为其精神归宿，构筑起独特的山水意象体系。

随着贬谪生涯的深入，柳宗元对自然的態度亦发生微妙变化。初到永州时，他所见山水多带有冷峻孤寂之感，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描绘的“极目萧条”⁹，反映出他早期对仕途挫败后的精神颓唐。然而，进入永州后期，柳宗元开始在山水中寻找一种超脱的境界。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自然景观，仍带有冷寂的色彩，这种对自然的哲理化观察，标志着柳宗元内心世界的进一步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的山水作品虽时常表达出归隐情怀，却并非真正“遁世山林”，而是游离于仕与隐之间的精神徘徊。例如，在《钴鉞潭西小丘记》中，他借小丘主人之口，说小丘是“唐氏之弃地”，他以弃地比迁客，寄寓了他怀才不遇之感，透露了作者无法排遣的孤寂之情与郁结不平之气。¹⁰在《渔翁》一诗中，他塑造了一个超然

⁷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卷30，页1958。

⁸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校注》，卷30，页1957。

⁹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891。

¹⁰ 吴文治、谢汉强主编，《柳宗元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2004），卷29，页89。

物外的渔翁形象，似乎表现出一种高蹈隐逸的情怀。主人公自遣自歌，突显出一种清贫乐道的情绪，“不见人”、“回看天际”等语，又都流露出几分高洁孤寂的情怀。¹¹这种亦隐亦仕的矛盾心理，正是柳宗元后期山水作品的核心主题之一。

综上所述，柳宗元贬谪后期的思想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愤懑不平到寄情山水、由入世理想转向哲理超脱的渐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山水作品成为他情感流动的容器，也成为他精神转型的重要见证。这种亦隐亦仕、孤高自守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心态，贯穿于他永州后期的山水诗文之中，形成了独特而深刻的艺术风格。柳宗元在自然中不仅寻求慰藉，更通过山水意象对自我存在、人生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重构。这种思想与艺术上的深化，不仅拓展了山水文学的内涵，也为后世士人在逆境中以山水寄托情志、探索精神自由提供了重要范式。

第二节 永州山水作品的主题特征

柳宗元后五年的山水作品展现永州的自然壮美的同时，折射出他在政治失意后的精神寄托、内心挣扎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从文本分析来看，柳宗元的山水作品主要体现了三个核心主题：借自然寄托人生感悟、在风景描写中融入政治隐喻，以及在思想层面逐步向道家与禅宗思想靠拢。

学者通常把《永州八记》视为永州游记的代表作，而且把这八篇文章视为一个整体，

¹¹ 吴文治、谢汉强主编，《柳宗元大辞典》，卷 43，页 163。

例如高文、屈光认为西山一文“领起其余诸篇”¹²，王更生则视之为“连章组诗式的艺术整体”¹³，其实这八篇游记并非同时之作。在被贬永州的前四年，他创作了如《小石潭记》《钴鉷潭西小丘记》《钴鉷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等一组山水散文，这些作品多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¹⁴此时的柳宗元已在永州蛰居近四年，初贬之时的愤懑之气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内省的观察与表达。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永州八记》之首篇，他通过对西山高远、险峻景色的描写，寄托了他摆脱政治泥淖、寻求精神自由的向往。他在文中写道：“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¹⁵游历西山之后，他不再像之前借醉酒忘却愁，而是以西山自比，渐渐将自己从惴惴不安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将自身情感寄情于西山景象之中，西山成为了他排解自我的灵魂安顿之地。然而，从其《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孤赏诚所悼，暂欣良足褒。”¹⁶可得知柳宗元本无游山玩水之好，只是将之视为抒解郁结的手段。登山临水，达到了抒怀的效果，可惜所得只是“暂欣”而已。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首段记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¹⁷

¹² 高文、屈光，《柳宗元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112。

¹³ 王更生，《柳宗元散文研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页196。

¹⁴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页126。

¹⁵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891。

¹⁶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柳宗元集校注》，卷43，页2931。

¹⁷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890。

昔日游玩往往醉而入梦。“醉”、“梦”表示游玩时的暂得之欣、须臾之欢，而之后的“觉”、“归”则表示重回尘世，忧患复生。正如《与李翰林建书》中所言：

“仆闷即出游……时到幽树好石，翫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¹⁸

因此，柳宗元到了永州以后的四年时间，闷即出游，有意藉山水以抒解羁囚情结。可惜效果不彰，“翫得一笑，已复不乐”。他藉景抒情的尝试是不成功的。¹⁹

进入永州后五年的后期阶段，柳宗元的山水作品风格愈加成熟与内敛，尤以元和七年（812年）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石渠记》、《石涧记》、《袁家渴记》等作品，他不再仅以景抒情，而是通过对自然地貌的整理、修缮与命名，赋予其思想象征。这些记叙既是对现实美的书写，也是情感的寄托。他看见永州山水美景不为人所赏识，于是为石渠“揽去翳朽，决疏土石”²⁰，为石涧“扫陈叶，排腐木”²¹，使石渠石涧之美显露出来。他写《袁家渴记》让袁家渴“传于世”²²，写《石渠记》让“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²³，写《石涧记》以便“后之来者”来游²⁴。写于元和八年的《游黄溪记》与后四记同调，结尾明言作记的目的是“启后之好游者”²⁵。他相信通过这些努力，袁家渴、石渠、石

¹⁸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与李翰林建书〉，《柳宗元集校注》，卷30，页2008。

¹⁹ 邓城锋，〈消解羁囚情结的不同尝试：柳宗元永州游记的重新解读〉，《屏東教育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类》2012年第39期，页8。

²⁰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石渠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926。

²¹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石涧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930。

²²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袁家渴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918。

²³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石渠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926。

²⁴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石涧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930。

²⁵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游黄溪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880。

涧、小石城山、黄溪这些美景，终于会为人赏识。此外，《江雪》一诗是柳宗元晚期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诗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²⁶的极端意象，构建出一个彻底孤寂、人与自然彻底分离的冰雪世界。这种绝对静谧的环境，既是外在自然的描写，也是一种内心状态的外化。诗中孤独垂钓的“渔翁”，虽然可被视为传统隐逸者的象征，但他在冰雪封山、天地凝结的严寒中泰然处之的形象，更表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人格境界。他借助自然景物的描绘，将内心的失落、不满与批判之情巧妙地加以隐蔽表达。这种创作方式既是对自我情感的疏解与疗愈，也是一种蕴藉而坚韧的思想表现。

除此之外，柳宗元后期的山水作品在思想层面逐渐呈现出向道家和佛学靠拢的倾向，表现出一种从现实政治苦难中抽离、追求精神超脱的哲学旨趣。他不再执着于直接表达对政治不公的愤懑，而是尝试以另一种视角去体悟个人命运的无常与人生处境的荒谬。在贬谪前期，他仍以儒家思维反思时局，认为自己被贬是小人当道、忠臣遭忌的结果，因此心存愤懑。然而到了后五年，他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更多地从《庄子》《老子》中寻求精神寄托，逐渐摆脱对政治的执念。在这一时期，他以山水为媒介，表达自己的孤独与思考，作品风格由愤世嫉俗转向超然自适。例如《愚溪诗序》：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²⁷

²⁶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江雪〉，《柳宗元集校注》，卷 43，页 2993。

²⁷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愚溪诗序〉，《柳宗元集校注》，卷 24，页 1607。

柳宗元在文中提及用自己的愚诗来歌颂赞美愚溪，人和溪水茫茫然不相分离，昏昏然同归于一，与自然混沌一片，可谓柳宗元的精神不知不觉地与全部与愚溪混为一体。²⁸从“茫然”和“昏然”两词可知柳宗元内心深埋着因贬官而抑郁不得志及无处发泄的痛苦。于是，柳宗元转而把自身寄托在道家观念如“鸿蒙”²⁹、“希夷”³⁰，极写为景色陶醉超世忘我的精神境界，即期望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³¹

综上所述，柳宗元贬谪后思想的转变与山水作品的深化密不可分。他在政治理想破灭后，转而以山水为载体，寄托其情感、思考与哲学追求，其山水散文不仅体现了自然美的发现，更是深层精神结构的表征。这种借景抒情、寓理于物的艺术风格，使柳宗元的山水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开创了“寄情山水，以道寄怀”的文学范式。

²⁸ 高文、屈光选注，〈愚溪诗序〉，《柳宗元选集》，页 172。

²⁹ 鸿蒙，指大气空间。《庄子·在宥》：“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参见：高文、屈光选注，〈愚溪诗序〉，《柳宗元选集》，页 172。

³⁰ 希夷，指空虚寂静的空间。无声曰希，无色曰夷。《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参见：高文、屈光选注，〈愚溪诗序〉，《柳宗元选集》，页 172。

³¹ 高文、屈光选注，〈愚溪诗序〉，《柳宗元选集》，页 172。

第三章 柳宗元山水作品的文本解读

柳宗元的山水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具独创性的一类文本，它不仅展现了作者高超的文学技巧和深厚的古文修养，更凝结了他在政治贬谪、人格孤绝以及与自然对话中的复杂情感与深邃思想。尤其是在永州后五年间所创作的山水游记与山水诗，集中体现了他山水书写从“感物兴怀”到“寄情传意”的演化过程。山水在柳宗元笔下，不只是自然景观的客观再现，而是其生命境遇、思想追索与文学抱负的集中投射。这种融合主观情志与自然图景的独特书写，使柳宗元的山水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与思想深度。

本章拟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切入，将重点围绕《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澗记》、《小石城山记》等代表性作品展开。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高度的审美结构，也在文体表达、叙事策略、命名方式及哲理探问方面呈现出独特而深刻的风貌，是柳宗元山水文学精神与文体技巧的典范。

第一节 柳宗元代表性山水作品的文本细读

相隔三年之后，柳宗元再度出游，并撰写游记，时为元和七年。何雅雯指出，此年的四篇游记与前面几篇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游记中不但不再提及同游的友伴，亦且不断流露出寻求广大的“他人”了解的企图，“传之后世”的意念转趋强烈。³²于是，山水

³² 何雅雯，〈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谈柳宗元永州游记〉，《东华人文学报》2013年第22期，页15。

外物中浓重的自我象喻成分逐渐隐约委婉，对景物的客观描写比例大为增加，反覆揭示景物之美。《袁家渴记》中说：

“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³³

《石渠记》云：

“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³⁴

《石涧记》则问：

“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³⁵

从《袁家渴记》对景点的命名方式，已经可以看出柳宗元面对山水自然时态度的变化，从《始得西山宴游记》始游之前的以为“皆我有也”，至于得到弃地、为之经营赏爱，都是以“我”为重心。至于此处的命名则尊重原来的主人，承认这是属于他人的空间，自己无从介入，故以地主姓氏为其命名，这种“得之”却“不敢专”的态度，若要切合于现实人事，当然与其长贬永州已达七年、屡次上书请还都无成果有关，然而若只就永州游记文本观察，则与在小石潭所感受到的自我之清美孤绝、无法逼视有关。

此外，《袁家渴记》特别点出“永之人未尝游焉”，这是一个无人了解的美好景色，他非但“得之不敢专”，并且要“出而传于世”，游记的预设读者是未知未觉、芸芸扰扰的“永之人”。《石渠记》则“惜”此美景“未始有传焉者”，相对于《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未始”与“始”都是个人的启蒙经历，此处的“未始”则是未始有人将山水自然

³³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袁家渴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18。

³⁴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石渠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26。

³⁵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石涧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30。

传与他人。柳宗元的预设读者是“后好事者”，希望他们能经由自己的撰写、传达，而能“求之得以易”。这都是一种希望透过山水自然与他人沟通了解的企图，尤其重要的是，所企求的沟通对象已经不是具有共同品味好尚的至交知己，“知音”的范围广及可以跨越空间与时间的众生。最后的《石涧记》尤其点出“古之人”与“后之来者”，以古人之乐、古人之超脱诠释自己的乐、自己的超脱，期待后世有人能“追”自己的足迹。

《石涧记》是柳宗元晚期山水游记中极具象征意味的一篇，其文本不仅描绘了深山石涧的幽静环境，也凸显出作者孤独心境与超越现世的精神追求。文中所云：“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是柳宗元面向历史提出的追问，既指向古人之乐，也表达了对后人的期待。这种双向的视角，一方面将自然山水中的宁静与澄澈视为古人共享的“乐地”，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践履”这一具体行为，唤起后人对自然之美与作者之情的感通。这种设问超越了传统山水记对“物”的描摹，将作者自身的哲学思考和时间意识融入其中。正如何雅雯指出，柳宗元试图在“古人—我—来者”之间架构一座精神的桥梁，使山水成为心灵的共鸣场。³⁶这种将自然描写与哲理思辨相结合的书写方式，体现出柳宗元山水游记晚期的一种新趋向——通过“物”之恒久来反观“人”之短暂，从而寄托自我对于知音、共鸣以及生命意义的深切渴望。

在《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诸篇中绵延不绝的是一个“传”的主题，这样的“传”又与六朝山水小品的再现自然式的如实传知、传述有所不同，是将个人的孤独感与体会之“乐”延伸向历史，寻求当下普遍大众与古往今来的“知音”。³⁷因此，这里不但重新融摄了元和四年诸篇游记的讨论焦点，还可以与元和八年的《游黄溪记》并

³⁶ 何雅雯，〈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谈柳宗元永州游记〉，页16。

³⁷ 何雅雯，〈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谈柳宗元永州游记〉，页16。

比而观。《游黄溪记》最后举出：“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

³⁸也是同样一种超越历史的努力。

在“传”的企图心之下，其实有着“疑”的基本驱动力，而所怀疑者，毕竟还是个人“夷”、“弃”的处境。《小石城山记》云：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傺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³⁹

此处的“疑”与《钴鉞潭记》、《钴鉞潭西小丘记》对各种弃地的慨叹相同，而更接近《游黄溪记》中记黄神的暧昧幽隐、若怪若神，出之以对“造物者有无”、亦即质疑天理是否存在的诘问。山水如此美丽清奇，对应于个人的才能志意，却又“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劳而无用”地弃置在“夷狄”之地，若有造物者、有天理，则山水与自己都不应至此。柳宗元又自己设辞作答，提出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⁴⁰，这是以山水“为我”、“皆我有”的主观态度，山水自然的存在只是为了抚慰自己这样的不遇之士；第二种则是“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⁴¹，将天理自然都归之于山水自然，认为人则缺乏此灵秀之气。何雅雯指出，柳宗元随即决绝地否定了这两种可能性。否定前者，其实正否定了造物者的存在，自然山

³⁸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游黄溪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880。

³⁹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小石城山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34。

⁴⁰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小石城山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34。

⁴¹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小石城山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34。

水不足以“慰”，不遇之士不但自伤沦落，也对自己多所怀疑。否定后者，则是对知音的持续企盼，冀望“人”仍有天地自然之灵气，可以透过对山水自然与文学作品的共鸣而彼此沟通。⁴²

第二节 柳宗元山水作品的文学风格演变

柳宗元的山水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鲜明而复杂的演变轨迹。这种演变不仅体现在文体由骈文向散文的转化上，也体现在叙述视角的不断调整与语言风格的丰富融合中。柳宗元的山水作品，不论是散文游记，还是山水诗篇，都不再满足于对自然景色的表层描摹，而是将自然与人生、哲理、情感深度融合，呈现出一种内敛而深远的文学美感。

柳宗元早期散文深受六朝骈文影响，讲求对仗、藻饰繁缛。但在永州的创作中，他逐渐突破骈文，转向更加自然、简练、富有节奏感的散文风格。这种文体变革不仅是语言形式上的简化，更是思想表达上的深刻化。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写道：“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遯隐。”⁴³这段文字不再以对偶、排比为主，而是以节奏分明、富于层次的语句展现西山的地貌特征，语言张弛有致，意象开阔。这种散文化的语言形式，既保留了文言文的韵致，又大大提高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

在文体风格的转变中，柳宗元的散文更加强调叙述主体的感受，将山水描写作为抒

⁴² 何雅雯，〈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谈柳宗元永州游记〉，页17。

⁴³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890。

情言志的媒介。《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便是代表之一：“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⁴⁴这段描写虽短，却巧妙地融合了视觉、听觉与心理感受，不仅呈现出幽静的自然景象，也传达出作者内心的恬淡与愉悦。而随后写道“悄怳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也。”⁴⁵，则转而透露出作者内心的孤独与现实的无奈。总体而言，《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通过冷寂景象与清幽环境的描绘，折射出柳宗元贬谪孤冷的人生境遇，也展现出他试图以自然山水寄托精神的努力。

叙述视角的演变同样是柳宗元山水作品风格演化的重要维度。他的永州山水作品常以“我”为叙述中心，但并非将山水作为主观情绪的全然附庸，而是借由山水折射自我认知与精神状态的变化。早期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尚存心灵与自然的契合喜悦：“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⁴⁶这种体验是一种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精神调和。然而到了《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澗記》等作品中，他愈发注重将山水之美分享于世，并试图在作品中建构更广阔的读者关系。他在《袁家渴记》中写道：“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⁴⁷这不仅是对自然美景的赞叹，更显现出一种“传之后世”的意识，一种从个体经验走向公共表达的叙述姿态。

这种由“我”到“后人”的视角变化，使柳宗元的山水作品不再只是孤芳自赏的寄情之作，更是一种具有历史意识与社会关怀的文学尝试。《石澗記》中更进一步提出：“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在此，柳宗元将自己的情感

⁴⁴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12。

⁴⁵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12。

⁴⁶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891。

⁴⁷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袁家渴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18。

经验与古今相通，意图在历史长河中寻觅理解自我者，这种视角的延展为其山水散文增添了哲学思辨的深度。

此外，柳宗元在语言风格上的探索也显示出其独特的艺术追求。他的语言既不完全承袭骈俪传统，也不同于唐代同时期韩愈的峻烈雄奇，而是表现出清丽、峻峭与庄禅意境的结合。《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凄神寒骨，悄怆幽邃”⁴⁸，用寥寥数语将潭水之寒与作者心境的萧索融为一体，带出幽境之中的冷寂与伤感。柳宗元的诗文语言也融合了佛道思想对自然与生命的思考，呈现出一种淡泊、超然的审美情调。《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⁴⁹，以孤寂意象营造出一种禅意空灵之境，语言虽质朴却蕴含无限哲思。这种文字风格的成熟，标志着柳宗元已不再以藻饰语言取胜，而是以情感打动读者。

⁴⁸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12。

⁴⁹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江雪〉，《柳宗元集校注》，卷 43，页 2993。

第四章 柳宗元山水作品的诗文互文性探析

柳宗元在永州后五年的创作中，既有山水诗的清丽冷峻，也有山水散文的哲思厚重。这种诗文并存、而以散文为主的现象，引发了关于其文体选择是否受到限制的探讨。通过分析其诗文作品的语言风格、抒情方式、思想倾向以及两种体裁之间的互文关系，可以更深入理解柳宗元在贬谪困境中所采取的文体表达策略。

在柳宗元的山水诗中，《江雪》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一首，其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⁵⁰营造出一幅清冷孤寂的山水意象，表达出诗人内心的疏离与孤独。这首诗语言极其简约，几乎无任何修饰语，却以高度凝练的意象表现出一种接近于禅宗的寂灭境界。其孤绝之感，不仅是对山水自然的冷观，更是对自身处境的隐喻。“独钓”不仅是动作描写，更象征诗人身处逆境仍自守节操的精神气质。类似的还有《溪居》一诗，“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⁵¹，写出贬谪之后脱离仕途、与世无争的隐逸之态，语言质朴无华，同时展现出情感的内敛与自我节制。这种写作风格既体现出柳宗元在诗体表达中的美学追求，也暴露出诗体在处理哲理思辨与复杂情绪时的局限性。

相比之下，其山水散文则展现出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通过对潭水幽深、环境寂静的细腻描写，引出“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⁵²的感叹，

⁵⁰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江雪〉，《柳宗元集校注》，卷43，页2993。

⁵¹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溪居〉，《柳宗元集校注》，卷43，页2968。

⁵²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9，页1912。

进而抒发孤独的情绪。这种由景生情、情寓于景的写法，不仅建立在对自然景物的精细描摹上，更通过散文体裁所允许的自由铺陈，实现了情感与思想的层层推进。在《石渠记》中，他更是直接写道：“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⁵³在此，柳宗元明确表达出对山水之美的传达欲望，不再仅仅是个人隐逸情怀的宣泄，而是对公共审美与历史记忆的主动参与。

此外，《袁家渴记》中提到：“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⁵⁴这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传”的姿态。柳宗元通过散文承载了诗体难以实现的公共性和历史性，其文体实践已由纯粹抒情走向了带有文化使命感的书写。正如景遐东所指出的：“文章可随心而走，拈景物，选角度，突出特色，避免了呆板的叙述和程式化体制”⁵⁵，柳宗元的散文文体以其开放性、灵活性成为其山水表达的首选。

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并非对诗体表达完全弃之不顾。在《愚溪诗序》中，他写道：“愚溪之上，昔为愚夫愚妇之所居也。余既为此邦之贱吏，因以愚名溪，而赋诗焉。”在这段序文中，诗与文的界限模糊，诗序不仅交代创作缘由，更成为柳宗元进行自我辩护与身份书写的重要手段。其所赋之诗虽简短，却在散文的铺垫下获得了更为深远的阐释力。这种“文中有诗、诗外有文”的结构模式，正体现出柳宗元在山水作品中善于调动不同体裁之间互文关系的能力。景遐东亦指出：“柳宗元以诗为文，吸收了诗歌营造意境的方法，使得其山水游记情景相生，营造出如诗如画的意境。”⁵⁶

⁵³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石渠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26。

⁵⁴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袁家渴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18。

⁵⁵ 景遐东，〈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体特征〉，《中国文学研究》2011 年第 9 期，页 4。

⁵⁶ 景遐东，〈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体特征〉，页 4。

《游黄溪记》也有类似的表达模式，其结尾写道：“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⁵⁷这是对前文景物描写与个人感悟的总结与升华，不仅强调作者与景物的私密关联，也体现出一种普遍性的审美诉求。通过这类记述性文本，柳宗元建立了一种文体上的开放结构，使得读者可以在景物之外，读出更多关于处境、心志乃至哲学层面的思考。

总的来看，柳宗元在山水作品中的体裁选择并非出于文体能力的限制，而是基于表达效果、思想深度与情感精度的全面权衡。正如张伯行在评《对贺者》时所言：“子厚既遭贬斥，知戚戚之无用，而姑为浩浩以自排遣耳。”⁵⁸，这句评论简明地揭示了柳宗元在遭遇政治沉浮之后，由愤懑而入超脱，以山水文字自遣心志的心理转变轨迹。也正是基于这种“姑为浩浩”的精神排遣与文体尝试，柳宗元得以在山水创作中实现情感升华与表达策略的自我突破。

⁵⁷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游黄溪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880。

⁵⁸ 柳宗元《对贺者》的背景：柳宗元被贬永州，有来自京师的人拜访，见柳宗元浩然之貌，以为他心境通达，便改慰问为祝贺，柳宗元回应的其中一段为：“庸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张伯行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福州：正谊书院，1868），卷 4，页 31。

第五章 结论

本文以“柳宗元永州后五年山水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与文体风格分析，结合时代背景与个人情感，系统探讨了柳宗元山水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征以及其所体现的文学价值。柳宗元在山水作品中表达出的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反思，也是对自然与生命关系的哲学思索。他质疑造物者的公允，如《小石城山记》所云：“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⁵⁹在山水的孤美与荒凉中，他察觉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与无奈，也寻求心灵的慰藉与价值的重建。可以说，他的山水作品不是消极遁世的产物，而是寄托政治理想失落后的精神抵达，是对“道”与“自然”的深层体悟与艺术再现。

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明确“永州后五年”这一时段，有效聚焦柳宗元山水作品的思想转折与情感变化；二是通过文本细读与体裁分析，揭示其山水作品在体式选择、语言风格及情感表达上的独特策略；三是结合当代文献与批评，构建起一条从写景到抒情、从个体经验到普遍文化心理的解读路径，拓展了柳宗元山水研究的视野。

然而，本文仍存在不足。一方面，由于时间与资料限制，对柳宗元与同期文人的山水作品未能展开横向比较；另一方面，对柳宗元哲学思想与宗教背景对山水写作的影响尚待深入探讨。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宽视域，将柳宗元山水作品置于中国山水美学与思想史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或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后世山水文人进行系统比照，

⁵⁹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小石城山记〉，《柳宗元集校注》，卷 29，页 1934。

探索其文学传统的延续与革新。

总之，柳宗元的永州山水作品不仅在形式上推动了散文发展的进程，更在内容与情感层面上，奠定了山水文学深沉内省、寓意深远的美学基调。通过本研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其“山水之文”所承载的个体经验、政治隐喻与哲学冥思，也为我们重读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自然”概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参考书目

专书（古籍）

1.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清]张伯行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福州：正谊书院，1868。

专书

1. 高文、屈光选注，《柳宗元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龚玉兰，《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3. 孙昌武著，《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王更生，《柳宗元散文研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5. 吴文治、谢汉强主编，《柳宗元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2004。
6. 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期刊论文

1. 邓城锋，〈消解羁囚情结的不同尝试：柳宗元永州游记的重新解读〉，《屏東教育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类》2012年第39期，页1-29。
2. 何雅雯，〈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谈柳宗元永州游记〉，《东华人文学报》2013年第22期，页1-29。
3. 景遐东，〈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体特征〉，《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9期，页6-9。